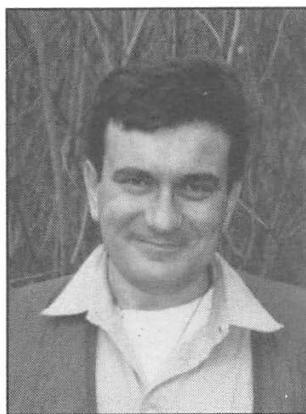


# 文革婦女訴說她們的故事

柯毅霖著 陳愛潔譯

## 國際上一種罕有的文學現象

一九八六年，Cheng Nian 在《上海的生與死》一書裡，以扣人心弦的筆觸描述她在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期間六年半的獄中生涯，獲得全球熱烈歡迎。她當然不知道自己正在開創一個成功的文學新潮流。其他在文革（官方的名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倖存、其後逃往西方的女性，也逐一發来回憶錄，而在最近幾年就有超過十多本。有些著作顯示出卓越的文學質素，有些



則獲得廣泛成功。其中最廣受讚揚的，是同類作品中最早期面世的著作：張戎的《鴻》（一九九一年）。這個長篇故事敘述了三代的中國女人，在國際文壇上獲得空前成功，已被翻譯成三十種語文，（包括中文，雖然該書在中國被列為禁書，）售出超過八百萬本。Anchee Min 的《紅色杜鵑花》（一九九五年）也獲得評論家的肯定，而且不少書評家更認為它是一部鉅著。這感性的回憶錄已翻譯為超過十萬種語文。

這些成功的作品在國際輿論方面為中國及其政治制度營造了某種形象，扮演重要的角色。很多讀者會把文革的種種惡行，跟他們在電視上看到天安門大屠殺的片段相提並論。同時，對於故事主人翁勇敢的掙扎和反抗懷有仰慕之情，當然促使人們更加認識中國人民，和他們的文化，因為在西方眼中，中國仍是一個神秘莫測和令人迷惑的國家。

這種嶄新的文學現象不但吸引廣大讀者、熱誠的書評家，和一些金錢掛帥的出版社的注意，亦

吸引部份文學批評家的關注。這些批評家認為這股新潮流冗長、使人厭倦，甚至有點兒不可靠。中國大陸的某些書評家認為這些回憶錄毫無特別之處，因為他們都曾與數以百萬的同志，生活在類似的經驗裡。其他人質疑有些作者因看到早期的自傳獲得成功，於是利用這個有利可圖的機會。

我將在本文裡描述這類書籍的某些特質，闡釋這文學現象的重要性及其引起的後果，還檢討評論家的反對立場和激發各方評論。

這些新回憶錄有什麼特別之處？

這些書籍的共同特色是：

- 作者幾乎全是女性；
- 這些回憶錄集中描寫文革期間的個人痛苦；
- 作者經已離開中國，現居於西方，而且幾乎全部以英文撰寫她們的回憶錄；
- 大多數作者都是都市女性，一般來自上海或北京；
- 她們受過高等教育；

• 在她們飽受折磨過後，雖然現在身處外國，總可算事業有成。

《上海的生與死》、《紅色杜鵑花》，Lo Fulang 的《晨風》（一九八九年）、Niu Niu 的《不爲毛澤東落淚：在文革中成長》（一九八九年在法國出版，並於一九九四年譯成英文）、Luo Ziping 的《迷惘的一代》（一九九零年）、Zhai Zhenhua 的《中國的紅花》（一九九一年）、Sun Jaia 的《白髮少女》（一九九六年）、Jiang Jili 的《穿紅領巾的女孩》（一九九七年），以及 Rae Yang 的《吃蜘蛛的人》（一九九七年）等，當然具有上述的特色。

其他幾部主要記述文革的回憶錄，也訴說作者及其家人在文革前後的生活。這些作品包括上述的《鴻》、Ye Ting-xing 的《悲風中的葉子》（一九九七年）、Chen Chen 的《來，看看太陽回家去》（一九九八年）（這是我唯一沒有讀過的著作，因爲在香港買不到）、Jan Wong 的《紅色中國的憂鬱》（一九九六年）（這位在加拿大出生的華裔中國少女，

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信徒，並返回北京參加文革）。

本文也會簡略提及其他幾部著作，內容也是以文革爲中心，作者同樣是女性。Ruth Earnshaw Lo 的《在颱風的風眼中：一位文革期間在中國生活的美籍婦女》在一九八零年出版，可能是首部由一位女性描述文革的自傳。Ruth Lo 與一位中國教授結婚，並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年。一九八四年，北京大學當代中國文學系教授樂黛雲與卡羅琳·韋克曼（Carolyn Wakeman）聯合出版《致風暴：一位中國革命婦女的歷程》。身爲知識份子，她被指爲右派，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八年期不斷受苦，最後獲得恢復共產黨黨籍，以及在北京大學的教職。至於《陷於旋風中：一位在文革中倖存的華裔美籍婦女》（一九九四年），則是 Wen Zengde 對 James R. Ross 訴說的經驗。Sirin Phathanothai 的《龍的珍珠：在中國上層社會中成長》描述一名在北京長大、並得到周恩來直接照顧的泰國少女的獨特故事。一九九六年，在上海出生而現居於美國的作家 Wang Pin 撰

寫《洋鬼子》一書。這是一本描寫文革的自傳式小說，獲得廣泛讚賞。一九九七年，在北京出生而現居於挪威的詩人及作家何東發表《問問太陽：文革中的童年故事》。在這六個親切卻又令人心寒的故事裡，何東描述在「紅太陽」毛主席統治下，活在絕望掙扎的童年，及在文革期間成長的一代。這些故事中的孩子既是無辜者，也是共犯。

## 何以這類回憶錄大多由女性撰寫？

據我所知，只有少數已移居西方的男作家用英語描寫文革的故事。第一本是在一九八三年面世，由梁恆與夏竹麗（Judith Shapiro）合著的《革命之子》。一九八七年，高遠也發表了《天生的左派：文革紀事》，但這本書的評價不高。一九九七年，Zhang Songnan 發表《草原上的牛郎》，是一本兒童書籍，描述文革期間他的兄弟在內蒙大草原的採訪故事。最後出現的是 Zhu Xiaodi 的《活在紅屋裡的三十年》（一九九八年）。我在此省略了著

名異見份子的著作，例如：《獨自站起來的勇氣》所收錄的魏京生書信集（一九九七年），和吳弘達已在英語書籍市場出版的三本著作《中國的古拉格》、《悲風》，以及《搗亂者》（一九九七年）。

那麼，為什麼這些個人的回憶錄幾乎都是女性撰寫呢？筆者沒有清楚的解釋。也許這現象與這些回憶錄親切和感性的內容有關。也許中國的女性比男性更傾向於分享內心的傷痕和感受。也許她們謙遜得願意披露自己的傷痕。不論東方或西方文學史都反映出女性從沒有受到鼓勵要沉醉於追求文學，但她們一旦寫作，便會選擇自傳的形式。至於作者們多來自大城市，這一點也不足為奇，因為城市提供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來自農村的婦女也可能以十分多元和生動有趣的風格描述文革。但是，我們仍未有類似的文學形式。同時，我們很幸運地有很多這類的著作，從前不論在中國國內外，都是很少作公開銷售的。

## 流亡海外者的回憶錄

目前，這些回憶錄的作者都在西方居住。其

中部份人士是自願渡流亡海外的生活。至於海外華人團體充滿問題的背景，也是用來分析這些個人著作的重要因素。對海外華人來說，分享經驗能使他們的過去更富意義，並為孤立和互相指責的生活增添點點安慰。

相比在國內發表作品，也許遠離家園會帶來更多表達和檢討的自由。對某些人而言，他們的著作可能導致他們要進一步遠離中國（例如：《紅色中國的憂鬱》，和《悲風中的葉子》）。事實上，儘管有些作者繼續回家探親，但這些書籍都沒有在國內出版或銷售。

中國政府已把文革定性為「全國的浩劫」。中國某些傳媒提到文革時加上引號：「文革」。這好像表示十年的「內亂」不值得稱為一次文化的革命。因此，大多數回憶錄在政治上並非錯誤，但仍須獲

得批准才可在中國大陸境內出版。

## 中國的傷痕文學

中國大陸的文學與新一類自傳的關係怎樣？

在毛澤東時代，文學與政治是不相稱的。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即四人幫倒台後，中國文學再次恢復它的旅程。中國的新作家表達他們在文革期間的痛苦經驗，因為當時的藝術家和知識份子都被視為罪犯。這種寫作形式稱為傷痕文學，是源自第一本和最重要的小說盧新華的《傷痕》。另一本屬於這種新文學形式的小說集，收錄了七位作家（全部是男作者）寫的八個故事，已翻譯成英文，並早在一九七九年在香港出版。馬波（筆名）以鏗鏘有力和從容自在的筆觸記述文革，他的《血染黃昏》一書，是中國最暢銷書籍（已售出超過四十萬本）。英文譯本（Howard Goldblatt 譯）在一九九五年問世。另一本以有力的筆法描寫文革的小說，就是馮繼才的《百花齊放》（英譯本在一九九六年出版）。

Feng Jicai 同樣是《百年瘋狂·口述中國的文化革命》的作者。英譯本在一九九六年出版。

八十年代期間，中國的「新現實主義」產生了新的文學風格：失落一代文學（下鄉青年的文學，他們是文革毀滅的一代）；尋根文學、工廠文學、報告文學、先鋒派文學。英語讀者也可閱讀其列中出版最受讚揚的作品的英譯本。上述機構也出版《中國文學雜誌》（小說、詩歌、藝術），目的是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的當代文學。在香港，《譯叢》（*Renditions*）也翻譯和刊登中國作家的著作。而一九八七年這一期是以當代女性作家為主角，收集了十八篇作品，其中大部份來自大陸。夏威夷大學出版社（檀香山）出版了《現代中國小說》系列，包括劉索拉的《混亂，這麼如此》，以及白樺（男作家）的《遠方有個女兒國》。一九九五年，女性自由作家 Wen Chihua 發表《紅鏡子：文革的孩子》。這個有趣的訪問集記載了十四個故事（Wen Chihua 的

中國大陸上的女作家

故事刊登在導言裡），描述文革期間知識份子子女的經歷。故事中的孩子仍居於中國。

首位讓公眾關注文革的可怕經歷的中國女作家，就是來自台灣的陳若曦（她的短篇小說集的英譯本見於一九九二年）。在大陸，最早描寫文革痛苦故事的女作家，計有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的作者，這是一本很受歡迎但頗具爭議的小說，英譯本在一九九五年面世），和《人到中年》的作家谌容。八十年代初，好幾位女作家也跟著做。上文提及的劉索拉，是一位令人難以捉摸的藝術家，也是被評為「褻瀆的小說」《混亂，這麼如此》的作者。小說用中文撰寫，在香港而不是在中國大陸出版。王安憶以備受爭議的社會問題作題材。梁麗芳形容後毛時代的女性都是更強而有力、對社會實況更敏感，比她們的男性伙伴更反叛。她小說裡的女性角色，由於經歷過文革，所以在重獲女性自我時也

常常遇到困難。一九九三年，Zhang Xinxin 的《我們這一代的夢想》的英譯本面世了。在芸芸當代中國女作家之中，殘雪被視為最激進的非具象派和後現代作家。《繡花鞋》譯文集，記載了她的故事，在一九九七年出版。其他的女作家包括：Chen Naishan、丁玲、Zhu Liu、戴晴等。

這些大陸女作家也採用文革作小說的題材，但她的藝術領域卻遠超這個範疇。處身於艱難的藝術環境，她們作為文學的先鋒，都善於嘗試新的意念和文學形式。她們的作品其中一個主要特色，就是興趣、風格，和多元的觀點（參閱《譯叢》，第廿七及廿八期，頁 9）。

## 失落的一代

正如我們在上文所提及的，其中一本英文回憶錄是《失落的一代》。回憶錄的主角大多數是迷惘的一代：她們「下放」到農村，在公社花掉了寶貴的青春，毫無溫暖或憐憫。她們都表達極大的挫

敗，而且深深感受到自己的青春被騙走，浪費了人生、思想力量和知識泉源。她們的生活，就是要長時間面對使人勞累的苦工，以及永無休止和毫無意義的政治集會。她們須向農民學習，結果卻發現在大部份時間裡，她們都不受歡迎的。農民認為這些既無經驗又動機不明的城市青年是一種負擔，還要與他們分享僅餘一點點的食物。Wen Chihua 採用悲涼的說話，形容在城市出生和長大的青年、這群失落的一代的傷痕（《紅鏡子》頁 28）。「這些不幸者當中，有很多人最終要留在鄉下超過十年，才可以設法返回城市。即使文革在一九七六年結束以後，有更多人再不能當城市人了。有人對於重拾城市的生生活感到失望，於是留下來，與農民結婚，過著艱苦的生活，在偏遠的農村努力謀生。其他青年死在鄉間，失去父母，變成了孤魂野鬼。七十年代靜悄悄地看著無數家庭變成了空巢，它們的基礎破碎了。……文革期間，有這麼多人被殺，這麼多人受傷，但更多人在同一的思想口號下被扭曲

了。革命是一座大熔爐，把我們的靈魂、我們的夢想燒掉，隨著火焰熄滅，剩下的只是灰土。」

直接和深入比較中國國內外的女作家如何描寫文革將是十分有趣的，不過已超出本文的討論範圍。我只會在這裡提及中國傷痕文學和迷惘的一代文學的「新現實主義」，與英文回憶錄之間的共同特點，這是本文的目的。這些個人回憶錄可被視為「傷痕文學」的新浪潮，因為它們見証了海外華人這一代在處理他們失去青春這悲慘史詩的治癒過程。

## 真實的自傳？

Cheng Nian（在《上海的生與死》）反過來對審問她的人說：「我怎能記得十年前我們講過的每一句話呢？」同樣的問題也落在她身上，因為有人懷疑她現在竟能詳盡記述一些發生在二十或三十年前的事，就像複印本一樣。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在個人回憶錄，包括蘇聯勞改場的回憶錄，記錄追

溯到很久以前的對話，都是源遠流長的傳統。

其他人問，作者們是否真誠地記述故事的每一面，因為有些角色似乎是反覆出現的：邪惡的官員、專制的家長式人物、無端的迫害，以及朋友的出賣。讀過這些書後，我要聲明自己並不贊同這些批評。作者們大多以明顯的客觀性來描述自己，也記錄自己的軟弱、錯誤的批鬥、出賣和罪行。這些自傳所載的歷史背景都是準確和可靠的。我們當然不在場，親眼看到發生了什麼事，但透過他們的故事，作者們把一種無可否認的真理和誠實灌輸在讀者的靈魂裡。筆者發現這些回憶錄的文筆很好，內容廣泛、感人和富靈感的。身為讀者，筆者不禁對作者們的掙扎和堅忍肅然起敬，並充滿仰慕之情。

## 尋常與不尋常的瘋狂的故事

正如上文所述，有人指責這些回憶錄已變成一種時髦的潮流，毫無新意，「你看過一本，就等於看過所有。」我不贊同這種說法。雖然我知道文

革的詳細歷史，但從不覺得這些故事翻來覆去。每一個故事都或多或少帶來新的角度，有助我們更深入認識當時的人與事。在《上海的生與死》裡，Nien Cheng 以有力的筆觸，描述在禁閉的思想中所表現的堅強和痛苦。《紅色中國的憂鬱》描寫一同時在西方資本主義和中國共產主義的環境下接受教育的中國女人的獨特經驗。同樣，在這部極好的回憶錄中，我們可分析文革與天安門大屠殺正好像一枚錢幣的兩面：一黨領導的意識形態，帝王的絕對權力。

《鴻》與《龍的珍珠》差點兒譴責八九年大屠殺的邪惡。《紅色中國的憂鬱》的作者 Jan Wong 以深入細膩的情感，敘述她親眼看到八九年發生的悲慘殺戮，以及緊隨的殘酷鎮壓。它也率直地見証人類的心理：凡經歷過思想轉變的人將透過 Jan Wong 的作品看到自己。

《龍的珍珠》從特別的角度描寫周恩來。他受托照顧和保護一位顯要的泰國政客為表示友好姿態而送給中國領導層的一個小女孩。即使周總理本

身也未能保護他視如女兒的泰國貴賓免受紅衛兵的凶殘攻擊。《紅色杜鵑花》的主角 Anchee Min（不願意地）被牽涉在備受蔑視的江青的派系鬥爭裡。

然而，Min 也能描寫毛澤東妻子較人性的一面。Rae Yang 的《吃蜘蛛的人》記述自己在擔任廣州紅衛兵隊長的時候，批評那後來當著黨第一書記的趙紫陽容忍資本主義。

《在颱風的眼中》描述一位長期居於中國而在文革期間備受折磨的外國人（Ruth Eamshaw 在中國住了四十年，主要擔任廣州中山大學的外文老師）。Wen Zengde (1900-1988) 的悲哀故事則記載在 James R. Ross 的《陷於暴風中》一書裡。她是一位美籍華裔女人，於一九五六年返國，在上海教授英語。她像《上海的生與死》主角 Nien Cheng 一樣，不肯認犯了間諜罪，而即使年老，仍要忍受多年的監禁、勞改、以及被紅衛兵問話和毆打。

有些故事的作者出身「根正苗紅」，《鴻》、《中國的紅花》、《吃蜘蛛的人》等書的作者，她們後來

成爲忠實的共產黨員，但也逃不了迫害。另一類回憶錄是屬於黑五類份子（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穿紅領巾的女孩》（一本兒童書籍）、《悲風中的葉子》、《白髮少女》等書的作者。

這類人必須掙扎反抗一種荒謬的假設：凡是出身黑類家庭的人自然懷有反革命的態度，而且都是有罪的。

## 善的力量，惡的力量

這些故事證明，人類精神比邪惡、仇恨，和壓迫等黑暗勢力更強。我們被主角持守家人的連繫、友誼的價值、一種基本上誠實和合宜的人生觀、他們的生命與希望所吸引。這尤其見於《上海的生與死》、《穿紅領巾的女孩》、《白髮少女》、《吃蜘蛛的人》，和《悲風中的葉子》。

回憶錄也反映出歷史和人性是那麼複雜和矛盾。如果作者們是受害者，那麼，她們也是迫害者：在《紅色中國的憂鬱》（例如：主角譴責同學），在

《吃蜘蛛的人》、《晨風》，和特別在《中國的紅花》等書裡，我們看她們支持那些製造侮辱、受苦、沮喪，和死亡的人。

《中國的紅花》主角翟珍華，訴說她作爲一個紅衛兵團領袖所擔當的角色，在所謂紅色恐怖時期（一九六六年八月底至九月底），他們劫掠北京各家各戶。僅僅一個月裡，單在北京已有一千七百人被殺，三萬三千六百個家庭被搶掠，以及八萬四千人被趕出城外。當年只有十五歲的翟珍華參與這些行動，要直接對十多人被毒打，以及至少一人 的死亡負責。

## 誰要對文革負責？

但是，這些青少年究竟要對自己的行爲負多少責任？難道他們的幼稚直率和天真熱誠，純粹被那些爲了個人政治利益而觸發文革的人所控制？況且，這些年輕的迫害者很快也成爲受害者，下放農村，過著辛勞、被剝削、有害和常常令人沮喪的生

活。顯然，紅衛兵並不是文革的荒唐行爲的負責人。

是否正黨的路線所重中，四人幫要負責？是否正如 Sirin Phathanothai 在《龍的珍珠》裡報導在一九六九年江青與周恩來戲劇性對話，江青要對文革負責任？或者，是否如張戎在《鴻》裡所描述的，人們普遍認爲四人幫事實上是五人幫，毛澤東本身是第五個成員，所以他要對文革負責？讀過十多本這類書籍之後，讀者也許仍感到困惑。當然，不論是組織或個人，都要承擔很大的責任。但是，沒有任何解釋能提供一個完全令人滿意的答案。

每日，紅衛兵接受「當局」的命令要批鬥某人；沒有毛澤東的同意和維護，不管是四人幫或江青，也不過擁有很少的權力；毛澤東親自派遣數以十萬的紅衛兵和其他激進份子下鄉，約束他們的革命狂熱，使城市恢復秩序。這似乎是某種的惡性循環，沒有個人或派系能完全控制大局。文革似乎不能得到任何合理的解釋。它反而是一種扭曲，儘管不是完全孤立的，卻既是神秘的又是罕見的人性現

象，在此大批人踏出人性的界限。頭腦停止活動，內心深底的邪惡湧現，而最激進的行爲亦隨之浮現。如果讀者發現這形容有點過份，或者是極端悲觀的，請再次閱讀這些回憶錄，或直接與任何涉及文革混亂的人士交談。

## 文革與大屠殺：一個共同的神學反省課題？

《上海的生與死》是唯一描寫作者如何以宗教信仰來抵禦迫害者的回憶錄。書中基督教佔有十分重要的角色。雖然這些故事的靈感並非源自宗教，但也談及痛苦。痛苦是涉及人類生命最終意義和方向的事物。痛苦的問題常引發人對天主提出問題。因此，能否在這些痛苦見証的基礎上作神學反省？我們已提出似乎不能回答的問題：誰要對如此極之愚蠢、可怕的暴力，和廣泛的謊言負責？同時，我對於很多歐洲知識份子和神學家質疑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大屠殺也感到驚訝。似乎不可能把這樣的悲

劇歸咎於一個邪惡的人，或邪惡的黨，或邪惡的意識形態。其實有更多的事物，是人類無法解釋的。

怎能令那麼多人作同樣的行為？大屠殺發生時，天主在那裡？發生了奧斯維茲集中營的事件後，有誰仍相信天主？很多信徒（特別是猶太人）認為沒有答案，而保持緘默是唯一的選擇。最近的一宗事件引起爭辯，事緣在奧斯維茲集中營的原址，住了一批天主教修女和豎立了一個十字架。那些反對在奧斯維茲出現宗教的人士說：「在奧斯維茲祈禱或豎立十字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平的，因為天主不在這裡。」

經過這次神學辯論後，我對於數個月前，一位非基督徒中國知識份子告訴我，文革對於中國知識份子所帶來的震撼，相等於大屠殺對歐洲神學家帶來的震撼，我對他的言論感到驚訝。這事怎能發生的？中國知識份子反問，在我們五千年的古老中國文明裡，這事怎能發生？基督徒神學家又問：在我們二千年的基督徒歐洲裡，這事怎能發生？這些

共同問題似乎為試圖從神學角度反省文革提供理據。

一位基督徒神學家反省文革，應考慮歷史神學會如何談及它。文革期間，基督徒與自己的同胞一起受苦。數以百萬計的無神論者、忠誠的共產黨員、虔誠的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徒、回教徒、好人壞人、無辜者和罪犯，都一起同受痛苦的命運。在這偌大的涕泣之谷裡，基督徒並不孤單。對於中國的基督徒來說，這意味著什麼？是否可以或應該努力從神學的角度了解如此不尋常的人類集體痛苦嗎？

本文所分析的書籍的作者並沒有提出這些問題。她們甚至發現這些反省是不恰當的，或難於理解的。正如讀者可能已推測到，是我特殊的神學興趣，推使我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我寧願留待日後研究，希望有讀者能對這研究作出貢獻。

□